

MEDIA

媒介素养 与政治传播

当代媒体新闻实践丛书 刘荃 主编

CONTEMPORARY MEDIA
PRACTICE SERIES

骆正林◎著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MEDIA

媒介素养 与政治传播

当代媒体新闻实践丛书 刘荃 主编

CONTEMPORARY MEDIA
PRACTICE SERIES

骆正林◎著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V English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媒介素养与政治传播 / 骆正林著. --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2. 3

(当代媒体新闻实践丛书 / 刘荃主编)

ISBN 978 - 7 - 5043 - 6595 - 8

I. ①媒… II. ①骆… III. ①传播媒介—研究②政治传播学—研究 IV. ①G206. 2②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1662 号

媒介素养与政治传播

骆正林 著

责任编辑 李晓霖

封面设计 亚里斯

责任校对 谭霞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010 - 86093580 010 -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政编码 100045

网 址 www. crtp. com. cn

电子信箱 crtp8@ sina. 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京南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30(千)字

印 张 19. 25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4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3 - 6595 - 8

定 价 39.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与政府执政能力建设	(1)
第一节 拥有较高的媒介素养是现代公民的必备素质	(1)
第二节 政府官员媒介素养对政府执政能力的影响	(4)
第三节 在现代舆论环境下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主要内涵	(11)
第四节 政府官员媒介素养提升的主要途径	(16)
第二章 适应执政转型 变革政府传播观念	(23)
第一节 执政环境的变化与政府执政方式的转型	(24)
第二节 舆论环境的变迁与政治传播观念的变革	(54)
第三章 尊重新闻规律 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67)
第一节 根据新闻体制的变化 调整政治传播政策	(68)
第二节 尊重媒体的职业特征 改进舆论引导策略	(85)
第三节 熟悉媒体的运行机制 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94)
第四章 参与内容生产 巧妙设置政治议程	(107)
第一节 根据新闻生产标准制作政治传播内容	(107)
第二节 按照信息把关原理控制媒体内容生产	(123)
第三节 根据文本制作规律建构政治传播文本	(144)
第五章 把握公众心理 提高政治传播效果	(163)
第一节 转型期中国公众社会心理的演变	(163)
第二节 公民参政背景下政治传播的策略	(179)

第六章 合理运用媒体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198)
第一节 和谐社会建设与媒体的角色定位	(198)
第二节 官员的媒介素养与突发事件应对	(210)
第三节 和谐社会建设与农村文化传播事业	(224)
第四节 农村群体性事件中舆论的引导策略	(237)
 第七章 贴近基层群众 顺应舆论民主执政	 (255)
第一节 政府的自信与社会舆论的理性传播	(255)
第二节 电视辩论透露出的“执政新思维”	(264)
第三节 政府官员的举止与公共形象的传播	(268)
 第八章 评析经典案例 借鉴前人得失经验	 (275)
第一节 汪精卫投敌后伪政权的舆论传播	(275)
第二节 伊战期间布什政府的形象传播与危机修复	(290)



第一章

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与 政府执政能力建设

政府管理过去一直被理解为是一种“权力现象”，政府和人民之间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然而，进入当代社会后，教育的普及和媒体的繁荣，放大了公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越来越多的公民逐渐认识到，他们有能力影响那些关乎他们生活质量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①面对公民参与意识的觉醒，国际上掀起了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公众越来越把政府看成是服务机构，而不是统治机关。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生活取得了很大进步，党的执政能力不断增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府行政越来越注重与人民的沟通，通过民主协商和自由讨论来提高政府决策的权威性。现代传媒是将先进技术与丰富信息进行完美结合的传播载体，它是公众与政府之间进行信息沟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政府官员只有提高媒体素养，才能有效地利用媒体实现与公众的沟通，不断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和行政的权威性。

第一节 拥有较高的媒介素养 是现代公民的必备素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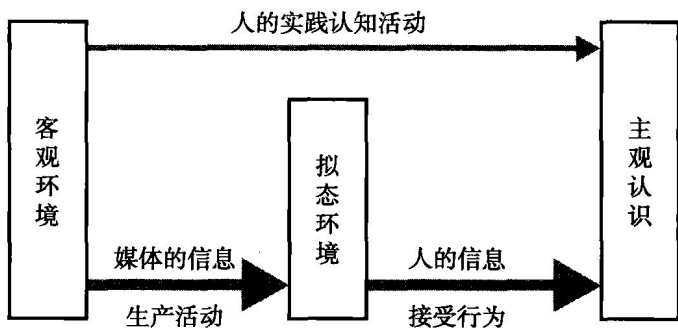
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在快速地被知识化和信息化，信息已经成了权力和财富分配

^① [美]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孙柏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媒体传播不可能对世界进行原原本本地复制，它只能选择“部分事件”和事件的“局部细节”进行传播，所以，媒体所营造的环境和现实存在的环境必然有一个差距。为了区别于客观环境，李普曼把媒体营造的环境称为“拟态环境”。



的轴心。当世界联成一体的时候，我们越来越需要把握世界，然而，我们每个人只能生活在地球的一个角落，只能在时间的长河中占据一个时间点，我们无法仅凭亲身体验来感知世界，还必须要通过媒体提供的信息来间接地认识世界。媒体传播不可能对世界进行原原本本地复制，它只能选择“部分事件”和事件的“局部细节”进行传播，所以，媒体所营造的环境和现实存在的环境必然有一个差距。为了区别于客观环境，李普曼把媒体营造的环境称为“拟态环境”。在当代社会，人们对世界的主观认识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通过自身实践直接地感知世界，一是借助拟态环境间接地认知世界（如图1-1所示）。



+ 图 1-1 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主要过程

在“国际贸易、出国旅游、跨国移民、媒体传播和各种各样的高科技信息流”^①的作用下，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这个全球化时代，“远距离传播变得更方便、更快捷、更经济(easier, faster, and cheaper)，而且传播的距离更广”。^②但是，无论传媒怎样发达，信息传播都不可能还原客观环境，对任何一次信息传播来说，事件变动的大部分信息依然

① Conrad Phillip Kottak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irror for Humanity: A Concise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ird edition, New York, McGraw - Hill, 2003, P32.

② Conrad Phillip Kottak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irror for Humanity: A concise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ird edition, New York, McGraw - Hill, 2003, P33.

被筛选到传播之外。随着人类对媒体的依赖越来越强,媒体对人类生活的干预也越来越大。有学者就指出,电视像恶魔一样,不仅抹平了人们的内心世界,破坏了人们的家庭秩序,而且将人类生活编入了“电视程序”,连最细微的地方都得到了管理。媒体在信息生产过程中,需要对信息进行选择、加工、编码后才能够进行传播,所以,媒体传播的内容渗透着传播者的主观判断,媒体常常成为“伪事件”、“伪环境”的制造者。

在社会的各阶层中都有一些有头脑的人,他们始终对媒体传播的信息保持着足够的警惕,不会对传播内容照单全收。然而,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他们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接触到多元的信息,没有对信息进行判断的专业技巧,更缺乏必要的逻辑思考,因此,普通大众最容易被媒体舆论所控制。正是看到媒体对公众具有诱导作用,西方的传播学者在媒体大众化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呼吁对公众进行媒介素养教育,以此来帮助公众更好地驾驭、控制和利用好媒体传播的信息。复旦大学陆晔教授将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历程,归纳为四次“范式转移”,^①媒介素养范式的每一次变化,都反映出西方社会关注媒介问题的中心转移。这里我们结合陆晔的论述,将西方媒介素养的范式转移简化为下面一个直观的表格(表1-1)。在我国的当代社会,新媒体不断出现,媒体舆论异常复杂,信息的穿透能力越来越强,所以,我国公民也必须要有良好的媒介素养,才能有效地利用媒体信息服务于自身的发展。

表1-1 西方媒介素养范式的转移

时间	范式	主题	主要观点
20 世纪 30 年代	第一代范式	培养公众的信息免疫能力	传媒是“带菌者”,传媒的内容对社会环境、高尚文化、青少年思想具有毒害作用。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是给公众打预防针,使公众对有害内容保持免疫能力
20 世纪 60 年代	第二代范式	培养公众对信息的选择和辨别能力	媒介内容并非全部有害,媒介不是工业文明的副产品,而是创造文化共同体的机制之一。媒介素养教育不是培养公众的免疫力,而是培养公众的选择和辨别力,使公众能够根据自身需要,对传播内容作出明智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20 世纪 80 年代	第三代范式	培养公众对文本的批判性解读能力	大众传媒具有制造“假性意识”的巨大潜能,它能够代表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强迫公众接受外部文化强加的价值观。因此,媒介素养的任务是培养公众对文本的批判性解读能力,使公众能够清楚文本中暗含的主流意识形态,揭示媒介真实与现实真实的差异

① 陆晔:《媒介素养的全球视野与中国语境》,载《今传媒》2008 年第 2 期,第 11-14 页。

续表

时间	范式	主题	主要观点
20 世纪 90 年代	第四代范式	培养公众的民主参与能力	媒介已经深深地介入到公众的生活中,公众早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媒介认知。媒介素养的教育不再是提升公众的文本解读能力,而是教会公众清楚媒介的运行机制,主动利用媒体进行民主参与,提高公众的民主素质,促进健康媒介社区的形成

在媒介化社会,政府行政离不开媒体,同时也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政府是社会发展目标的制定者,也是社会活动的组织者,当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各级官员应该积极主动地审视社会环境,利用媒体来提升政府的执政能力。“领导干部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个体对社会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发展的领导和推动力量对社会产生影响。”^①为了提升政府的执政能力,政府官员应该不断提升媒介素养,学会熟练运用传媒,不断推动政府的各项事业的发展。

第二节 政府官员媒介素养对政府执政能力的影响

执政能力是指执政者利用国家权力管理国家和军队,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执政权威,巩固执政地位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是指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治军能力的总和,它包括确保党的核心领导地位的能力,驾驭国家机构和社会力量建设国家的能力,协调社会矛盾、化解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处理外交事务、改善国际关系、提升国家形象的能力,等等。王金红认为,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我党的执政方式是“革命化执政”,具体表现是:“党政不分,权力高度集中,少数人甚至个人说了算,‘人治’重于法治,依靠广泛的政治动员和政治控制推行其路线、方针、政策。”^②“大跃进”和“文革”是这种执政方式的两大败笔。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执政方式转变为“建设性执政”,具体表现为强调民主与法制,强调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领导干部走向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

① 齐冬梅:《领导干部科学素养的调查分析》,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第38页。

② 王金红:《转变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载 http://www.ycwb.com/gb/content/2004-09/23/content_766535.htm。

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更是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近一阶段的中心工作来抓。

在近代史上,我们的党和政府一贯重视大众传媒,一直将媒体视为党的耳目喉舌。“一部现代新闻传播史,处处写着执政党与大众传媒密不可分的互存、互动关系。执政党能不能在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和新闻传播规律的前提下有效使用和正确驾驭大众传媒,是衡量其执政能力高低优劣的重要标示。”^①当前,媒体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公民的参政意识不断增强,公共舆论在政府决策中的地位得到了强化。媒体是公共舆论形成的重要平台,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提高,可以帮助政府在舆论引导上争取到主动权,从而提升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

一、官员的媒介素养影响执政为民理念的确立

执政为民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基础。过去,我们的基层政府行使的主要是社会管制功能和经济建设功能,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民生、民情的关注。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首的新一届中央政府,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并把“以人为本”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在信息时代,信息是重要的公共资源,合法地获取信息是公民应有的权利,掌握着大量公共信息的政府,只有不断地为公众提供信息服务,才能提升自己的合法性和公信力。“以人为本”包括政府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和表达权,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必然是一个自信政府,是一个信任人民的政府。政府官员具有了良好的媒介素养,就会相信公众的智力和判断力,就敢于公开公共信息,能够利用媒体与公众沟通,分散政府的决策成本,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和应变能力。

然而,那些媒介素养不高的官员,往往对信息公开持怀疑态度,“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对于公众特别感兴趣、迫切想要

媒体是公共舆论形成的重要平台,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提高,可以帮助政府在舆论引导上争取到主动权,从而提升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

政府官员具有了良好的媒介素养,就会相信公众的智力和判断力,就敢于公开公共信息,能够利用媒体与公众沟通,分散政府的决策成本,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和应变能力。

^① 童兵:《大众传媒的使用与驾驭:执政能力的重要标示》,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130页。

了解的敏感话题,往往习惯于保持沉默,或故意回避,或做‘冷处理’,甚至通过不恰当的手段强行封锁、控制。”^①要知道,在传播技术非常发达的时代,信息传播能力非常强,盲目地封锁消息,不仅会影响政府工作的正常开展,而且往往会把政府置于舆论的不利位置。2008年春天发生的雪灾,由于一些地方领导怕灾情影响地方形象,因而耽搁了灾情信息的发布。雪灾后的第五天(1月18日),电视新闻中还有“黄淮江淮持续冰冻天气大部分地区交通恢复”的报道,后来在观众的质疑声中媒体又悄悄更正:“雨雪妨碍交通,寒冷仍将持续。”1月23日,湖南郴州已开始停电停水,广州火车站已有十多人滞留,然而一些地方电视新闻中还在报道:“2008年全国春运全面启动,雨雪天气影响暂时消除。”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也是直到1月23日才在头条报道:“南方出现大范围雨雪天气,交通严重受阻,各地全力疏导滞留旅客。”信息发布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救灾工作的开展,也给地方政府的形象造成损害。在突发性事件中,政府只有快速发布信息,才能在第一时间抢到“发球权”,才能在事件处理中争取到主动。2003年“非典”期间,原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相继辞职;2005年在吉林化工厂爆炸引发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辞职。三位高官因为信息发布不及时而相继辞职,反映了新一届中央政府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也看到了政府践行执政为民的决心。

二、官员的媒介素养影响政策试探功能的发挥

在信息传播非常发达的时代,公共政治越来越走向世俗化,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变得越来越强。阿尔蒙德认为:“在这种世俗化的政治文化中,社会公众越来越重视在周围世界中可以把握的因果关系,人们用明确的方式而不是用笼统的方式来观察客观事物,自信拥有改变外部环境的能力,社会评价越来越注重个人成就而不是世袭地位”。^②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良好媒介素养的政府官员,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应该在自由辩论的基础上,实现民主决策。所谓“民主决策,就是要通过一定的机制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③

① 丁柏铨、夏雨禾:《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党的媒介形象展现》上,载《当代传播》2008年第3期,第6页。

② 李笃武:《政治发展与社会稳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稳定问题研究》,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③ 李贺林:《从五个方面提高民主执政能力》,载 [http://theory. people. com. cn/GB/40551/3337604. html](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51/3337604.html)。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媒体是进行政策试探的重要工具。媒体对政策制定过程的充分报道,可以吸引公众参与讨论,试探政策推行后社会情绪的反应。在媒体的争论中,政府可以广泛地吸纳民间智慧,调整政策中不够完善的内容,使政府制定的政策充分反映群众的愿望;可以洞察群众心理,充分估计公众对政策的承受能力,预测政策实施的社会成本;可以把握公共舆论的变化规律,增强行政活动的预见性,“减少使用行政强制力的几率,使行政行为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支持和参与,放大行政效果”。^①如全国人大在制定婚姻法的过程中,允许媒体充分报道,吸引公众广泛讨论,最后在民意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修改,从而使新的婚姻法更能尊重人的权利,更能维护社会秩序。媒体素养差的领导人,往往忽视民间舆论,行政过程中独断专行,使行政的随意性、盲目性变大,最终带来的是社会动荡和政治腐败,严重影响到政府的权威和信誉。

三、官员的媒介素养影响社会预警机制的完善

任何政府都会将社会稳定作为社会治理的首要任务。社会发展必然带来社会矛盾,政府执政不可能没有偏差,因此,社会治理始终伴随着风险和困难。作为一个明智的政府,它应该对社会矛盾和问题保持高度的警觉,建立起社会预警机制。社会稳定包括政治局势、经济形势、思想情绪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预警指标一般包括痛苦指数、腐败指数、贫富指数、不安指数等内容。媒体在社会预警和社会稳定方面都能发挥积极的导向作用,因此,政府官员必须要利用媒体完善社会预警机制,争取在社会治理中获得主动权。媒介素养差的官员,往往忽视媒体的信息发布,轻视媒体舆论的力量,对媒体早就报道的社会问题长期不重视,结果当突发事件发生时,政府陷入到非常被动的境地,甚至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

社会越发展,人类的交往就越频繁,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媒体是进行政策试探的重要工具。媒体对政策制定过程的充分报道,可以吸引公众参与讨论,试探政策推行后社会情绪的反应。



社会发展必然带来社会矛盾,政府执政不可能没有偏差,因此,社会治理始终伴随着风险和困难。作为一个明智的政府,它应该对社会矛盾和问题保持高度的警觉,建立起社会预警机制。



^① 曾国平、周家明、曾庆双:《政府形象策划及其四维向度分析》,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58页。

突就越多,所以,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越发展社会矛盾就越多。现代传媒是一个庞大的产业,拥有专业化的信息采集队伍,它们分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随时捕捉社会上发生的新情况和出现的新问题。商业化的运作机制,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媒体全天候地监测着社会环境,只要政府善于利用媒体,就能够比较准确、及时地搜集到社会舆情,发现潜在的社会矛盾。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劳资纠纷、就业困难、分配不公、治安隐患、贪污腐败等问题还在相当程度地困扰着社会发展。在社会矛盾多发期,政府官员如果反应迟钝,措施不力,应对失误,一个偶然的事件就可能酿成严重的后果。我国政府了解民情有两个主要渠道:信访渠道和传媒渠道,而传媒渠道因为影响面大,传播速度快,更是收集舆情的理想渠道。在汶川大地震中,媒体对救灾物资的质疑,无疑使政府触摸到了民意之所在,积极加强了对赈灾物资发放的监督和审计,从而赢得了民心。试想,“没有人民的参与和监督,中央的监督或者审计,能够覆盖到如此广泛的赈灾和重建领域吗?”^①很多群体性事件的诱因,媒体上都已经反复报道,只要政府能够利用媒体完善预警机制,就会在社会治理方面赢得更多的主动权。

在新媒体环境下,媒体规模不断放大,媒体所有权越来越分散,政府不可能完全控制所有媒体。新的舆论环境要求政府官员必须要提高媒介素养,转变管理媒体的作风和方式,修正政府管理媒体的原有制度,积极、主动、有效地占有舆论阵地。

四、官员的媒介素养影响政府对舆论阵地的占有

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的讲话中指出:“新闻舆论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对社会精神生活和人们思想意识有着重大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对舆论阵地的占有能力。在传统媒体环境下,党和政府控制着媒体的所有权,媒体成了党和政府传播意识形态和进行舆论引导的重要工具。然而,在新媒体环境下,媒体规模不断放大,媒体所有权越来越分散,政府不可能完全控制所有媒体。新的舆论环境要求政府官员必须要提高媒介素养,转变管理媒体的作风和方式,修正政府管理媒体的原有制度,积极、主动、有效地占有舆论阵地。

^① 郑永年:《让人民参与、监督赈灾与重建》,载《南方周末》2008年6月5日E32版。

在现代社会,公众心理快速觉醒和成熟,他们渴望美好社会,渴望世界和平,渴望免于压迫,渴望主宰自己的命运,那种用居高临下的灌输来获得人民的忠诚的时代已经过去,政府必须要在与人民的真诚沟通中才能获得人民的尊重。然而,我们的一些官员,依然分不清新闻与宣传的不同。“一些党政领导和新闻主管部门往往要求大众传媒及新闻工作者,在具体的新闻工作中,完全根据一般宣传的需要来确定报道内容和报道方式,许多并非新闻的日常党务活动被作为新闻加以报道,频频见于媒体。”^①这种轻视公众权力和智力的做法,很难使传播内容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2003年3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了改进会议报道和领导人活动报道问题,会议要求在新闻报道中要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密切党群关系。中央领导的身體力行,正是高层领导具有良好的媒介素养的具体体现。近年,高层领导在公众场合下的新闻多了,这不但没有影响舆论导向,反而提升了高层领导的公众形象。

应该说,经过党和政府的多年教育,传统媒体已经形成了良好的自律机制,它们会积极配合党和政府的舆论引导工作。新媒体却不同,政府对它们基本上没有直接的所有权,它们的管理层无法被纳入政府体系,新媒体没有中心结点难以绝对封锁信息。可是,我们的一些政府官员依然用管理传统媒体的方式来管理新媒体,或者对新媒体疏于管理,甚至不知道怎样管理。结果造成了传统媒体失去公信力,失去了舆论引导的主阵地,而新媒体中的流言,甚至是谣言却大行其道。由于过于强调官方口径,强调舆论一律,有时公众情绪会单向聚焦,使民族主义心理复苏,甚至会产生舆论暴力。党和政府要想提高执政能力,必须在舆论引导上寻求新的突破。

五、官员的媒介素养影响政府公众形象的塑造

马基雅维利曾经告诫统治者:“人们进行判断的习惯,一般是依靠眼睛更甚于依靠双手,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你,但是很少人能够接触你;每一个人都看到你的外表是怎样的,但很少人摸透你的实质如何,而且这些少数人是不敢反对多数人的意见的,因为后者受到国家最高权威的保护。”^②在现代社会,公众同样无法直接接触到政府官员,但是他们却能够通过媒体天天和他们见面,公众对政府官员的评价往往不是在生活交往中实现的,而是通过媒体传播的信息去判断的。鉴于媒体对塑造政府和官员的公众形象具有重要作用,所以,西方政治人物特别重视媒体,他们会主动地进行自我形象策划,用公众能够接受的标准来打造亲民的形象。我们在电视上经常会看到,一些国家元首特别

^① 丁柏铨、夏雨禾:《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党的媒介形象展现》,载《当代传播》2008年第3期,第6页。

^② [意]马基雅维利:《君王论》,徐继业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页。

愿意在镜头前显示自己的运动“天赋”，以此来表达他“与民同乐”和充满活力的形象。如卡斯特罗的棒球、老布什的跳伞、普京的柔道、小布什的山地车等都曾成为政治人物形象策划的经典。所以，西方学者指出，西方国家的首脑只需要中等的智力水平，但是却必须要学会在媒体面前讨好公众的技巧与能力。

我们党一直要求自己的干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清正廉洁、充满活力，然而，政府和官员的公众形象不是自诩的，而是公众对政府和官员的社会评价和心理认同。我们的政府官员不可能像西方政客那样刻意包装、伪装自己，我们强调的是为民办实事，真心诚意地为人民谋福利。但是，政府和官员的形象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它在关键的时候可以发挥象征与号召作用，因此，从政府的有效行政来看，政府官员同样需要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要学会主动地利用媒体塑造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2008年5月24日，在地震救灾最困难的时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经在汶川县映秀镇的野外举办了一场记者招待会。温总理在招待会上向记者承诺，如果记者“三个月以后来看，这里会更加有序；三年以后来看，这里会建设得更好”。温总理在救灾现场就地组织记者招待会，不仅体现了政府公布救灾信息的勇气和决心，而且体现了政府带领群众战胜灾难的坚强信念。

政府和官员的形象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它在关键的时候可以发挥象征与号召作用，因此，从政府的有效行政来看，政府官员同样需要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要学会主动地利用媒体塑造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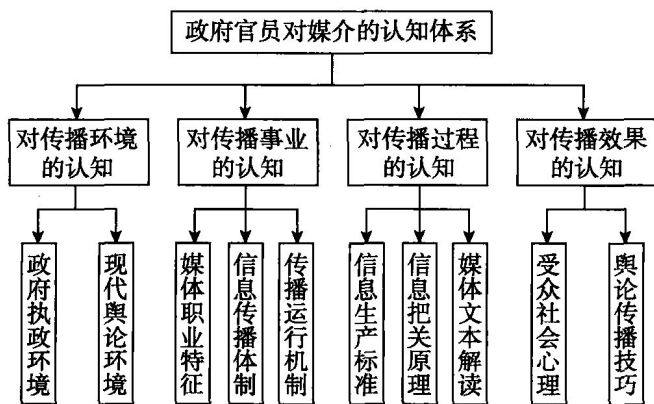


图1-2 温家宝和潘基文在映秀镇记者招待会现场

第三节 在现代舆论环境下政府官员 媒介素养的主要内涵

在信息时代,获取和利用信息是人类谋生的手段,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前提。政府是社会权力的中心,政府官员必须具有良好的媒介素养,懂得媒体运作规律,掌握舆论引导策略,才能有效地利用媒体,提高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是指公众对媒介传播环境、传播事业、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的认知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上运用媒介调节公众、媒体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能力的总和。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就是政府官员对媒介知识的认知程度,以及运用媒体为政府行政服务的能力。它包括官员对媒介的认知系统和对媒介的运用系统两部分,其中媒介的认知系统又包括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其中的每一个方面又包括一些子系统,如图1-3所示。

图1-3 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结构示意图



媒介素养 (Media Literacy) 是指公众对媒介传播环境、传播事业、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的认知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上运用媒介调节公众、媒体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能力的总和。



一、对传播环境的认知

信息传播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政府官员只有

深入了解了传播环境,才能更好地摆正政府和媒体的关系。政府官员所面对的环境包括执政环境与舆论环境两部分。对政府官员来说,执政环境与舆论环境是两个相互作用的变量,舆论环境在变化,执政环境也在变化,正是执政环境的变化才凸显出舆论环境的重要。如果政府官员以传统的执政思维来看待媒体,仍然用绝对控制的手段来掌控媒体,那么提高官员的媒介素养就成了多余的东西。正是公民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的提高,才使政府由治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公共舆论才能够在政治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素质的提高,一个公众参与政治活动的新公民社会正在逐渐形成。从国际范围来看,各国政府都面临着从统治(government)向治理(governance)的转型,统治强调统治者利益的最大化,而治理却最大限度地尊重公共利益。面对世界潮流,我们的政府也审时度势,将公共利益作为政府的价值定位,将改善民生作为政府的时代责任。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要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概念。“服务型政府应该具备现代的服务理念和服务能力,能够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与优良的公共服务。”^①服务型政府强调以人为本,约束自身行为,尊重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如果政府官员依然以自我为中心,不重视人的尊严和平等,无论怎样利用媒体来粉饰太平,也不可能转变公众对政府的看法。然而,受到传统执政思想的影响,一些地方官员还难以适应新的执政环境,在执政过程中漠视公民权利,迷恋意识形态美学,政治话语中过多的宏大叙事。直到今天,一些地方政府还将“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违法上访坐牢罚款”、“打一场规范信访秩序的人民战争”等标语挂得满街、满村都是。政府官员只有在适应了现有的执政环境,形成了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能够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这样才能谈得上利用媒体。国家计生委出台的一些新标语,如“地球妈妈太累了,再也擎不起太多的孩子”,显示出更多的人文色彩,是新的舆论环境下标语宣传的良好样板。

舆论环境是社会环境的一个子系统,随着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我国的舆论环境也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过去媒体被认为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政府可以比较从容地管理媒体。然而在新的媒介环境下,新兴媒体不断出现,传统媒体走向市场,传统媒体的官方色彩也在不断弱化。“过去是党‘一只手’掌控媒体,如今是市场和党‘两只手’在牵引媒体。”^②在市场的作用下,媒体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围绕领导人的活动和讲话,为

① 王春福:《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及其实现》,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12卷第2期(2008年4月),第37页。

② 叶皓:《政府新闻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